

俄烏戰爭爆發的緣起、發展與進程： 雙重安全困境的詮釋^{*}

許菁芸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為由，派遣俄軍進入烏克蘭領土，自那時起雙方衝突即進入全面戰爭，並迅速發展為二戰以來歐洲規模最大的軍事衝突，戰事至今邁入第四年，俄烏仍在烏克蘭境內與烏東地區交戰，烏克蘭領土、建設與人民受到相當程度的重創，大量難民移往歐洲各地。儘管各國領袖已為俄烏雙方進行斡旋，衝突雙方亦經歷幾輪談判，但仍未見停火的共識，直至川普於2024年11月5日的總統大選中獲勝，重返白宮開啓了「川普2.0」時代，並積極協調俄烏停戰。本文以安全困境理論與螺旋模式分析，聚焦於2022年俄烏戰事開打至今，相關物質和心理調節因素探討。可以發現，導致北約、俄羅斯、烏克蘭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雙方往往採取自認為增加安全的措施，雖然是無意圖的，例如積累不必要的進攻性能力，但結果卻適得其反：更多的力量帶來更少安全。

關鍵詞：俄烏戰爭、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北約、烏克蘭

* 筆者非常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委員群對此論文悉心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提供本文修繕與更多延伸性的思考。

壹、前言

2024 年 3 月 15 日至 17 日，俄羅斯舉行總統大選，無黨籍現任總統普京以 87.28% 創紀錄的得票，毫無懸念地以約 7,627 萬張選票獲得連任。2020 年修憲後，俄羅斯對於總統候選人資格有諸多限制，並且普京任期歸零，得以再一次競選總統，外界普遍預期普京將繼續執政到 2036 年。2024 年的選舉對普京而言尤為重要，他不僅要獲勝，還要看到高投票率和支持率，因為這可以讓普京和他身邊的人繼續相信大多數人的確支持他，並相信俄烏戰爭掀起了全俄羅斯人民愛國主義熱潮。至於西方國家普遍對於 2024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持懷疑或諷刺態度，包括烏克蘭、美國、德國、英國等，均評價俄羅斯大選「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歐盟發布的官方聲明裡雖然稱此次選舉為「沒有選擇的選舉」，但並沒有說不承認其結果（除了 2014 年克里米亞及 2022 年烏東四州的公投結果）；美國也聲明，將會「基於普京作為俄羅斯總統的事實進行合作」（Анисимова, 2024）。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去軍事化（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去納粹化（денацификация）」為由，派遣俄軍進入烏克蘭領土，自那時起雙方衝突即進入全面戰爭，並迅速發展為二戰以來歐洲規模最大的軍事衝突，也是自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以來，莫斯科與西方之間最大的對抗，而該軍事行動被普遍視為入侵。為了促使俄方撤兵，以美國與歐盟為首的西方世界紛紛向俄羅斯祭出制裁，俄羅斯也自 2022 年 3 月底將主要戰線轉往烏東地區，並調整對烏戰略，將從北部撤出的部隊重新部署到頓巴斯，為的就是鞏固烏東地區的勢力。然而，戰事至今邁入第四年，俄烏兩軍仍在烏克蘭境內交戰，烏克蘭領土、建設與人民受到相當程度的重創，大量難民移往歐洲各地。這幾年間，各國領袖已為俄烏雙方進行斡旋，衝突雙方亦經歷幾輪談判，但一直未見停火的共識，直至川普於 2024 年 11 月 5 日的總統大選中獲勝，重返白宮開啓了「川普 2.0」時代。川普針對俄

烏戰爭一直以來的基調便是「停戰」，隨著川普上任後，美烏的關係越來越微妙，俄烏戰爭的停戰條件對烏克蘭越來越不利，再者，在川普 2.0 時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下文皆以北約稱之）未來是否能繼續肩負歐洲安全，也令數十年來一直信任美國作為其最強大保護者和夥伴的北約盟友起了質疑（Mao, 2025）。

安全困境或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國際安全理論之一，源起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傳統現實主義（Wheeler & Booth, 1992: 29），而安全困境理論和更廣泛的螺旋模式（Spiral Model）透過相互作用構成了強大的戰爭與和平理論，動態式地呈現導致戰爭爆發和維護和平（即扭轉或緩解安全困境）的整體架構。安全困境被學界廣泛用來解釋重大事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Jervis, 1976: 58-114; Snyder, 1985: 153-179）、冷戰的起源和結束（Jervis, 2001: 36-60; Kydd, 2005: 28-78; Collins, 1998: 201-119），以及前蘇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爆發的種族衝突。

自俄烏戰爭開打至今，關於俄烏戰爭的分析與論述極多，戰事至今已入第四年，北約、烏克蘭和俄羅斯都呈現出拉鋸戰的情勢，彼此在國家安全上相互忌憚，局勢僵持。筆者認為安全困境與螺旋模式，應可對俄烏戰爭的起因、發展做一詮釋。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係以安全困境理論併以主觀與客觀的國家安全利益，連結螺旋模式，進而發展本文之安全困境與螺旋模式架構，並以此框架分析俄烏戰爭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發以來至今的發展過程，聚焦於北約與俄羅斯、俄羅斯與烏克蘭間的雙安全困境，與 2014 年後三方進入螺旋模式，促使俄烏戰爭爆發的物質（material）與心理（psychological）調節因素，進而探討並觀測俄烏戰爭（結束）的未來發展。

貳、安全困境理論與螺旋模式

一、安全困境的定義

安全困境的概念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獻記載的西元前五世紀。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名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道：「雅典力量的增長而導致的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無法避免」（Lieber, 1991: 6）。對「安全困境」此一概念較早進行闡釋的是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國政治學家赫茲（John H. Herz）；而美國政治科學家傑維斯（Robert Jervis）則曾於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對安全困境理論進行詳細的探討。

安全困境的概念起始於巴特菲爾德，他追溯安全困境的起源並稱之為「霍布斯式的恐懼」（Hobbesian Fear）¹或「人類的普遍性罪惡」（universal sin of humanity），並認為安全困境可能會促使各國陷入戰爭，即使它們可能不想互相傷害：「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爭可以在沒有任何可能故意傷害世界的干預下發生」，它可能在兩個強國之間產生，而這兩國都迫切希望避免任何形式的衝突，因此安全困境的起源是無意圖的（unintentional），但安全困境引發的衝突卻是悲劇性的（Butterfield, 1951: 19-22）。

赫茲是學術界提出「安全困境」此一名詞的第一人，²他認為：

1. 霍布斯式的恐懼，係指自己可能因對方而產生深切的恐懼感，但是，卻無法理解對方因為自己亦產生的恐懼感，甚至無法理解對方為何會出奇地感到恐懼。你自己知道對他人不會形成威脅，除了希望保護自身安全之外，不希望從對方那裡奪取任何東西。但你永遠也無法準確地理解，對方不可能知道你心裡所想，所以永遠也不會像你那樣瞭解自己的意圖。由於雙方都是這樣推理，所以彼此的問題處於錯綜複雜的相互關聯之中，雙方都無法認清自己所處困境的真正面貌，因為雙方都認為對方滿懷敵意（Jervis, 1976: 62）。

2. 赫茲在 1951 年撰寫的《政治現實主義與政治理想主義》（*Political*

「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民族國家（或地區）間相互不信任、相互懼怕，安全就成為首要目標。為獲得安全，各國竭力增加軍費，意圖獲得軍事上的優勢，改善自身的安全狀況。但由於軍備競賽是互動的、無止境的，一國的軍事優勢很快被其他國家同樣的擴軍努力所取代，因此絕對的安全是不可能的，各國陷入了一種無法解脫的困境之中。」（Herz, 1959: 231）也就是說，在無政府狀態下，由於對其他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意圖的恐懼和不確定性，各國為了自身安全而累積了越來越多的權力。

傑維斯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當一國為了增強自身的安全而採取的各種方式必然構成對別國的安全威脅時，就存在安全困境問題」（Jervis, 1978: 169）。傑維斯將安全困境定義如下：「防禦性行動下無意圖和非預期的後果」（these unintended and undesired consequences of actions meant to be defensive）（Jervis, 1976: 66）、「一個國家試圖增強其安全的許多手段卻降低了其他國家的安全」（Jervis, 1978: 169-170; 1982: 358; 1988: 317; 2001: 39），以及「即使他們能夠確定其他國家目前的意圖是善意的，他們也不能忽視其他國家將來變得具有侵略性的可能性，也不能可靠地保證他們自己將保持和平」（Jervis, 1976: 76）。

柯林斯（Alan Collins）根據學者對安全困境的定義做一總結（Collins, 1997: 11-14），大致包含以下四種意涵：第一是意圖的不確定性，此類定義主要側重於解釋安全困境這種現象的起源，關注於國家間的互動，認為這種無法解決的不確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是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此類定義的代表人物有巴特菲爾德、赫茲、布思（Ken Booth）和惠勒（Nicholas Wheeler）；³第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一書中即率先使用此一名詞（Herz, 1951: 17）。

3. 布思和惠勒強調武器、不確定性（與其他國家的武器相關）和恐懼是安全困境的三個基本要素。由於根據安全困境的結構性根源，不確定性和

二是對其他國家安全的損害，係因安全困境的運作所產生的結果，強調一國如何因其所採取的行動而無意間損害了他國的安全，如布贊（Barry Buzan）；⁴ 第三是彼此安全的減損，亦是安全困境的自我減損（self-defeating）特性，係指增加國家的權力，並不必然增加其自身的安全，因為鄰國和對手也會訴諸同樣的手段。也就是說，安全困境定義為一種情境，於此情境下，一國為加強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將招致他國反應，最終使得與該國先前關係相比更不安全，如波森（Barry Posen）；⁵ 第四是缺乏合適的政策或機制，這種定義強調國家所處的絕望境地，無論採取哪種選擇，均無法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法，如斯莫克（Richard Smoke）。⁶

此外，傑維斯認為無政府狀態乃國際關係中一個永久性的特徵，表達了「安全困境無法消除，只能改善」的論點，並認為安全困境的嚴重程度可以透過物質因素（例如科技、地理）和心理因素（例如恐懼、民族主義、對衝突歷史的記憶和錯誤知覺）來調節（或嚴重或緩和），因此他主張建立安全機制（security regimes）以對國家間

恐懼是無政府狀態的本質衍生（Booth & Wheeler, 2008: 31-40）。

4. 布贊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各國必須自求多福，以保證其福祉及政治與社會價值觀能繼續生存……這種結構方面的必要性實為權力與安全困境的核心，同時也特別說明了在無政府狀態下所產生的安全問題」（Buzan, 1991: 294-295）。
5. 波森認為當國家保持攻擊態勢固然是使安全困境惡化的重要因素，但另外還有一些被認知的因素，諸如敵方的形象、考量雙方相互得失的思維與民族優越感，也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而降低安全困境以因應攻擊與防衛的變化，實是一個重大的錯誤（Posen, 1993: 27-47）。
6. 斯莫克指出：「在本質上，安全困境的觀念認為，如果一國在保衛自己安全上無所作為，它不會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衛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脅到他國或多國的安全，結果該國面臨著一個困境；如果它不採取行動，它將不會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樣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Smoke, 1991: 76）。

的權力鬥爭施加某種規範性限制。在這個機制中，各個國家認同一定的準則、規範、原則，而這些規範性原則可使加入其中的國家彼此互惠互限（Jervis, 1982: 375）。

二、安全困境與螺旋模式

赫茲和傑維斯斷然否認安全困境是所有衝突的核心，並以國際關係中的嚇阻模式與螺旋模式來解釋其論點。嚇阻與螺旋兩種模式的差異主要在於對手的意圖。運用嚇阻模式時，對手具有惡劣的意圖，只有加以嚇阻，決策者才能保護其國家。反之，螺旋模式則強調布局，安全困境為雙方均無意圖傷害對方，使政治人物能據以遂行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由於意圖不明（懷疑單方或雙方意圖轉為惡意），會開始對對方有所疑慮與恐懼（Jervis, 1976: 75-80），又因單方或雙方意圖為惡，使彼此強化物質或心理調節因素，致使戰爭或戰爭威脅。因此，運用螺旋模式與安全困境有明確的關聯。但是，安全困境如何連結螺旋模式，進而導向戰爭或戰爭威脅，有必要使用國家安全利益衝突概念作為解釋變項。

作為守勢現實主義的關鍵概念，安全困境理論也必須以國家之間經常存在真正的國家安全利益衝突為出發點。尋求安全的動機是用來確定某種情況是否屬於安全困境的另一個概念，此概念由格拉澤（Charles Glaser）提出，隨後由塔利亞費羅（Jeffrey Taliaferro）和羅伊（Paul Roe）採用（Glaser, 1992: 497-538; Taliaferro, 2000-2001: 128-161; Roe, 2001: 103-116）。其基本概念是，當國家的動機是尋求安全時（即當國家的行為受安全利益驅動時），就會出現安全困境。相反地，當國家的動機是非安全追求時（即當國家的行為是由非安全利益驅動時），安全困境就不適用，或至少其適用性減弱。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的區別在於，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衝突）既有主觀層面，也有客觀層面，「主觀利益」依據各國不同地緣戰略環境、內政因素，尤其最重要者為「決策者」所確

認其主觀國家利益的優先考量；「客觀利益」包括：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經濟財富、集體自尊等，國家利益衝突既可以是可相容的（reconcilable），也可以是不可相容的（irreconcilable）（Wolfers, 1952: 481-502）。這兩個層面使得國家利益衝突的組合與安全困境變得相當複雜，當兩國之間存在主觀和客觀安全利益衝突時，筆者認為就產生四種可能的國家安全情境（請見表 1）。

表 1 國家安全利益矩陣

		主觀安全利益	
		相容	不相容
客觀安全利益	相容	蟄伏的（dormant）安全困境 【I】	激發的安全困境 【II】
	不相容	虛幻的相容性（灰色地帶） （illusory compatibility）  螺旋模式 真實衝突幾乎無可避免 安全困境通常不適用 【III】	真實的不相容性 真實衝突幾乎無可避免 安全困境一般不適用 戰爭 【IV】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 （一）第一種國家安全情境【I】是客觀和主觀的國家安全利益衝突都可以相容。在這種情況下，安全困境會發生，但很可能仍然處於蟄伏狀態。雙方都正確地認識到彼此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可以相容的，且都沒有惡意，激發蟄伏安全困境所需的權力競爭就不會發生，真正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極小。儘管如此，實際衝突仍然是可能的，因為安全困境很容易因一方或雙方的失誤而引發，而安全困境又可能推動雙方陷入實際衝突。
- （二）第二種國家安全情境【II】是國家利益衝突是客觀上可以相容，但主觀上不可相容。當一個或兩個國家錯誤地主觀認為它

們的安全利益是不可相容的，則這種不可相容是由於錯誤知覺（misperception）所造成的，因此是虛幻的（illusory），但由於雙方都沒有惡意，因此出現真正的安全困境（Boulding, 1959: 130; Jervis, 1976: 75-76）。這裡，主觀不可相容性可能一開始就存在，也可能是安全困境（動作和反制）引發的一方或雙方彼此的錯誤知覺。在這種情況下，實際衝突並非不可能發生，而是可以透過妥協（即合作）完全避免，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能否認識到彼此的利益並非真正不相容，並採取措施向對方發出信號並瞭解對方的（良善）利益。在第二種情境下，激發了蟄伏的安全困境，實際衝突並不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總是可以避免的。

- （三）第三種國家安全情境【III】是安全利益衝突客觀上不可相容但主觀上可以相容，屬於虛幻的相容性，此時為灰色地帶，容易導致進入螺旋模式。在這種情況下，錯誤知覺再次凸顯，但與第二種情境完全相反：一方已經是惡意的，但另一方錯誤地（也許只是暫時地）認為他們的利益是可以相容、衝突是可以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存在深刻的錯誤知覺，但安全困境通常並不適用，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安全困境或一方或雙方轉向惡意意圖，繼而轉向螺旋模式，在惡性循環下，實際衝突就難以避免。
- （四）第四種國家安全情境【IV】是客觀和主觀安全利益衝突都不可相容。安全困境通常不適用，因為一方或雙方可能已經有了惡意，而且雙方都知道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實際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一方屈服於另一方的要求），戰爭由此產生。唐世平將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式描述為可逆且漸進的連續體（Tang, 2009: 587-623）。因此，筆者結合唐世平的安全困境連續體模式和上述之國家安全利益矩陣，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兩個國家都是守勢現實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它們無意

威脅彼此的安全。然而，雖然兩國無法確定彼此當前或未來的意圖，但是雙方在主觀和客觀的國家安全利益上是可以相容（國家安全情境【I】），或客觀上可以相容而主觀上不相容，但是如果能以保證確認雙方沒有意圖，雖有安全困境，卻是激發的安全困境（國家安全情境【II】）。如果此時一方或雙方產生錯誤知覺，每個國家都傾向於擔心對方可能是或可能成為掠奪者。因為雙方都認為權力是實現安全的手段，所以雙方都尋求累積越來越多的權力，即使是主要的防禦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進攻能力，一方為自身安全而採取的許多措施，往往會威脅或被視為威脅另一方的安全；即使雙方只是想保衛他們的安全，此時就會進入激發的安全困境（國家安全情境【II】）。因此，對方很可能會對這些防禦措施採取反制措施，而這些措施就包含物質（例如科技、地理）和心理（例如恐懼、民族主義、對衝突歷史的記憶和錯誤知覺）的調節因素，如有安全機制調控也許可逆回國家安全情境【II】或【I】，請見圖 1 灰色地帶上之雙向箭頭。但是如果一方已轉為惡意，而另一方卻認為主觀上可以相容，則會形成虛幻的相容性的灰色地帶，如果此時雙方沒有安全機制的調控，或安全機制沒有作用，則可能進入螺旋模式（國家安全情境【III】）。這些行動和反制措施的相互作用往往會加劇他們對彼此意圖的恐懼和不確定性，從而導致惡性循環，其中每個人都透過自我強化或正向回饋機制累積更多權力，但不一定使自己更安全。這種惡性循環導致雙方在客觀和主觀上的利益衝突都不相容（國家安全情境【IV】），從而引發不必要的悲劇性衝突——戰爭或戰爭威脅。也就是說，守勢現實主義國家互動可能導致行動和反制的循環，使恐懼和不確定性持續存在，逐漸導致一個國家（惡意擴張主義國家）或兩者（惡意僵局國家）變得具有進攻性。此時，螺旋模式開始起作用，安全困境就不再適用，進而導致戰爭或戰爭威脅（請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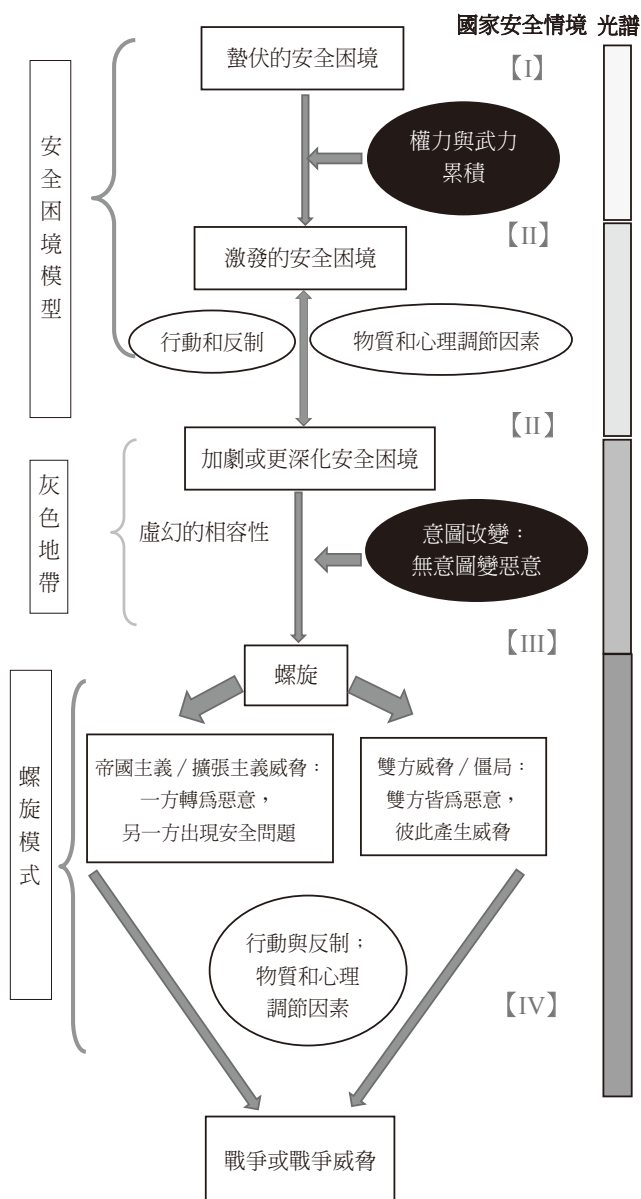


圖 1 安全困境與螺旋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唐世平 (Tang, 2009: 619) 之資料自行繪製。

參、俄烏戰爭回顧與發展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稱因應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DPR）、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 LPR）領導人的請求，宣布在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並強調俄羅斯的目標是該國的「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非占領烏克蘭領土，而美國與歐洲國家第一時間宣布對俄羅斯嚴厲經濟制裁。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Maria Zakharova）指出，那些積極關注烏克蘭局勢的人八年來一直無視頓內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並稱西方對俄制裁早有準備，烏克蘭的事態僅是藉口。此外，為應對外國制裁，俄羅斯聯邦隨即宣布將對歐盟制裁實施反制措施。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則宣布戒嚴，全面動員所有 18 歲至 60 歲的烏克蘭男性公民，並禁止他們出境。

一、初期行動：從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底

從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底，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從烏克蘭東、南、北三方包圍，以高精度武器摧毀烏國軍事設施和基地、控制機場、掌握主要城市對外的連結道路等，期望以武力迫使基輔政權同意談判、承諾不加入北約，以滿足俄羅斯的安全要求。

雙方交戰初始，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均認為戰事應該很快就結束，但北約諸國快速支援烏克蘭，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打死不退、振奮其國人共同抗敵，同時，不對稱戰爭態勢：無人機、反坦克武器與手機網路運用，均讓俄羅斯措手不及。

俄羅斯此次的特別軍事行動，在烏克蘭拒絕談判後，俄軍很快占領北部的車諾比核電站、南部靠黑海地區，也對烏國首都基輔進行包圍之勢。烏軍則開始在第二大城哈爾科夫（Kharkiv）等地進行四面伏擊，造成俄軍地面部隊傷亡。3 月初，俄羅斯已控制了多個黑海城

市，包含戰略要地赫爾松（Kherson）、歐洲最大的札波羅熱核電廠（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並持續對基輔和第二大城哈爾科夫轟炸。俄羅斯雖然宣布已掌握烏克蘭的制空權，但是，實際上在北部戰線，由於美歐西方國家早已幫忙培訓烏克蘭軍隊，且戰爭初期大量軍援烏克蘭，俄羅斯反而遭受重大損失和基輔周圍烏克蘭的強大抵抗，俄羅斯的前進在3月陷入停滯，3月底軍隊撤退至烏東。

二、轉向烏東：2022年3月底起

起初，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之行動模式似乎是訴求快速占領目標標的，以便尋求談判，但因為烏克蘭的頑強抵抗、西方的金援與軍援源源不斷，再加上對俄制裁越加嚴厲，使俄方的特別軍事行動陷入戰況膠著，也讓普京下令俄羅斯軍隊將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威懾力量置於「特別戒備」狀態。

3月29日，隨著雙方在土耳其舉行的第五輪談判落幕，俄羅斯國防部決定「重大戰略改變」，將部隊撤出烏國首都基輔周邊。但是隨著俄軍逐漸撤出烏西，戰爭的焦點轉向以下兩大方面。

（一）布查鎮及基輔周邊發現平民被大量屠殺事實（Bucha Massacre）

針對俄羅斯軍隊撤出烏克蘭首都基輔周邊地區後，當地街上發現許多平民屍體，烏克蘭當局發起對俄羅斯戰爭罪調查。不過，俄羅斯否認相關指控。但是隨著之後衛星影像的公開，以及當地倖存者的證詞和攔截的音訊，在在證實了俄軍在占領期間對當地平民的暴行，也使得更多國家譴責俄羅斯，呼籲俄羅斯退兵，並加重對俄羅斯的制裁外，美國也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金援給烏克蘭（Horton et al., 2022），其中包括榴彈砲，這也是美國首度向烏克蘭提供重型火砲系統，而俄羅斯向拜登（Joe Biden）政府發出一系列警告，包括正式外交抗議，要求其停止向烏克蘭運送可能襲擊俄羅斯領土或未指明的「不可預測後果」的先進武器，否則將承擔不可想像之後果。

（二）俄羅斯將主要戰線移往烏東，大規模集結軍隊，固守烏東地區

俄羅斯將主要戰線轉往烏東地區，也調整對烏戰略，將從北部撤出的部隊重新部署到頓巴斯，爲的就是鞏固烏東地區的勢力。俄羅斯軍隊在更換號稱「屠夫」的新指揮官蘇洛維金將軍（Sergey Surovikin）後，軍事行動迅速擴大，而烏軍的傷亡人數不斷增加（Черкасов, 2022），前線顯然停滯不前，引起提供武器和訓練的西方國家部分人士不滿和批評。

三、烏東四區公投併入俄羅斯：2022 年 9 月

烏克蘭軍隊於 2022 年 8 月在南部發動反攻，並於 9 月在東北部發動反攻。9 月 30 日，俄羅斯吞併了在入侵期間部分占領的烏克蘭四個州。俄羅斯於 9 月 23 日至 27 日在烏克蘭東部頓內茨克（Donetsk）、盧甘斯克（Luhansk）、赫爾松及札波羅熱（Zaporozhye）四個地區舉行入俄公投，普京於 10 月 5 日正式簽署俄羅斯接納新領土與組建聯邦新主體的聯邦憲法，片面併吞烏克蘭四州的法律正式生效（Dickson & Morrow, 2022）。此四區正式載入俄羅斯憲法，俄羅斯聯邦主體再增四個（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赫爾松州及札波羅熱州）。因此自 2022 年起，依照俄羅斯憲法第 65 條規定，俄羅斯是一個由 24 個共和國（Republic，包含 2014 年加入的克里米亞共和國、2022 年加入的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九個邊區（kray）、48 個州（oblast，包含 2022 年加入的赫爾松州和札波羅熱州）、一個自治州（autonomous oblast）、四個自治區（autonomous okrug）及三個直轄市（Moscow; St. Petersburg; Sevastopol），恢復爲 89 個聯邦主體構成的聯邦制國家。

與此同時，俄羅斯從波羅的海（Baltic Sea）連結德國的兩條北溪天然氣管線，在 9 月 26 日出現不明原因漏氣，在外洩前地震學家

記錄到兩起規模可能相當於幾百公斤炸藥當量的大爆炸。歐盟和周邊幾個國家已排除技術故障等因素，認定是遭到人為攻擊。⁷

9 月底，普京宣布開始從受過軍事訓練的 30 萬公民及可能有資格的約 2,500 萬俄羅斯人中徵兵後，出境的單程票幾乎或完全售罄。在東北部的攻勢中，烏克蘭於 9 月成功奪回了哈爾科夫州的大部分地區；在南部的反攻過程中，烏克蘭於 11 月奪回赫爾松市，俄羅斯軍隊撤退至聶伯河東岸。

爲了鞏固占領區域，蘇洛維金開始設下橫跨烏克蘭南部的三道防線，它是由戰壕、雷場、龍牙、鐵絲網和射擊障地組成的龐大防禦網絡，被稱爲蘇洛維金防線（Surovikin Line）。蘇洛維金防線成功將反攻的烏軍牽制數月，導致烏軍不能如哈爾科夫反攻般達成迅速向亞速海推進的戰略目標（Epstein, 2023）。至此，俄烏雙方展開戰地攻防拉鋸戰，互有嚴重損耗，傷亡慘重，烏克蘭雖然在 2023 年夏季又開始一波大反攻，但是根據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分析，雖然烏克蘭軍隊在戰爭中保持主動權，但在夏季攻勢高峰期，從 2023 年 6 月初到 8 月下旬，其南部戰線平均每天僅推進 90 公尺。至 9 月底，烏克蘭在該地區的進展僅前進了約 10 公里，而烏克蘭在 2023 年夏季的反攻中遭受的損耗比先前的攻勢更大（Jones et al., 2023）。

戰事持續至今，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遭俄方毀滅性轟炸，大部分基礎設施被摧毀或部分損壞。2024 年 8 月 6 日，烏克蘭成功「突襲」俄羅斯之庫斯克地區，深入俄羅斯境內，但是筆者認爲，烏克蘭的反攻主要是在戰術上分散俄羅斯的注意力，並沒有起多大的效用，

7. 北溪管線爆炸事件調查於 2024 年 2 月結束，但未查明肇事者。俄羅斯認爲是西方所爲，目的是爲了給予俄羅斯併入四州公投的警告，並斷絕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需求所可能的緩靖政策，而美國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爲其可以大量增加液化天然氣對歐洲的輸出（Gardner & Lewis, 2022）。

反而引起俄羅斯的報復，對烏克蘭的轟炸更加嚴重。且烏克蘭是突襲庫斯克一個約 50 英里乘 20 英里的區域，以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小來看是微不足道的。而實質上戰爭至此，已無可能有任何重大的進展，俄烏間的戰事也已在 2022 年底開始停滯，陷入僵局。根據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2024 年 7 月的分析，美國援助的轉變正慢慢對戰場產生影響，即使更多援助的到來，俄羅斯的攻擊也許會減少，烏克蘭的反擊會更有力道，但也只是領土上些微的更迭——這裡增加幾公里，那裡減少幾公里。從戰略上講，戰爭仍是一場血腥的僵局，如果美歐無法繼續大幅度援助烏克蘭的話，整體戰局和領土不會有重大的變動（Cancian, 2024）（請見圖 2）。而 2025 年 1 月川普上任後，筆者認為美俄間進行的停戰協議，最終只會在目前領土維持現狀的情況下達成。

俄羅斯和烏克蘭軍隊控制區域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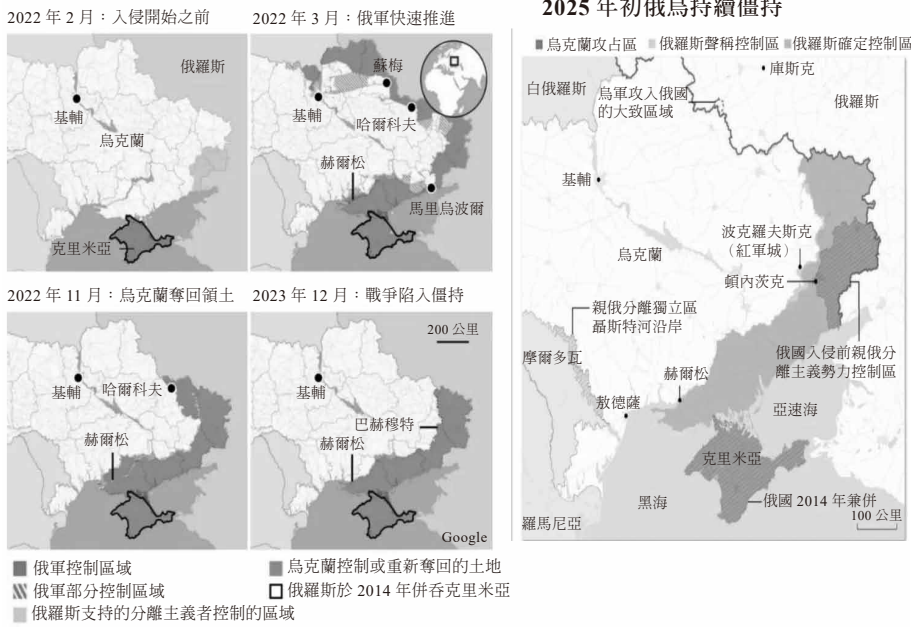


圖 2 2022 年至 2025 年烏克蘭被占領土的變更

資料來源：江昱蓁（2025）。。

這場戰爭造成了歐洲自 1990 年代南斯拉夫戰爭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和人道危機。在俄烏戰爭的第一週，聯合國報告超過 100 萬難民逃離烏克蘭，據歐盟稱，目前約有 420 萬烏克蘭人在歐盟國家獲得臨時保護，這使他們有權獲得居留許可、工作權利及醫療保健和教育機會。數量最多的是德國，截至 2024 年 2 月，德國有 113 萬烏克蘭人，難民數量第二多的國家是波蘭（96 萬）。但是，令人訝異的是，接收烏克蘭難民最多的國家是俄羅斯，有 125 萬烏克蘭人（Bernard & Miller, n.d.）。這其中的原因應該是自 2022 年 3 月底後，俄烏戰線移至烏東和烏南地區，烏東和烏南地區本來就以俄裔居多數，俄語人數眾多，加上 9 月烏東四區併入俄羅斯，因此，部分烏東和烏南的烏克蘭人反而逃難至俄羅斯，但是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調查，俄羅斯將烏克蘭無家可歸的兒童和平民強制移轉至俄羅斯本土，俄羅斯當局採取了簡化程序，授予無家可歸的兒童或孤兒俄羅斯公民身分，且這些兒童將有資格被俄羅斯家庭收養（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22）。但是據烏克蘭當局稱，俄羅斯軍隊在被俄羅斯占領的烏克蘭領土上強行將烏克蘭人驅逐轉移到俄羅斯，並將他們冒充為難民。

肆、俄羅斯、烏克蘭、北約：雙安全困境的詮釋

俄烏戰爭的發生可以應用安全困境的詮釋，而這場戰爭起源於雙安全困境，俄羅斯與北約的安全困境（國家安全情境【I】→【II】，蟄伏轉向激發的安全困境）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安全困境〔國家安全情境【I】→【II】→【I】→【III】，蟄伏轉激發，再轉蟄伏，又因烏克蘭廣場革命（Maidan Revolution）直轉至螺旋模式〕，會出現國家安全情境的轉變，在俄羅斯與北約間大多是由於物質性調節因素，如科技、地理。但是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方面，則大多為心理

調節因素，如親歐或親俄。雙安全困境的發展至 2014 年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後出現交集，螺旋模式產生，2014 年至 2022 年間，烏克蘭和北約、俄羅斯皆強化物質與心理調節因素，烏克蘭和俄羅斯間的螺旋開始攀升。2021 年 3 月至 4 月，俄羅斯軍隊開始在烏克蘭東邊集結。2021 年 6 月的布魯塞爾峰會，北約重申了 2008 年在布加勒斯特峰會上做出的烏克蘭終將加入北約的決定後（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1），2021 年底，俄羅斯在烏克蘭周邊進行第二次大規模軍事集結，烏克蘭為安全問題更轉向北約，惡意螺旋攀升，2022 年 2 月 24 日戰爭發生，持續至今（國家安全情境【IV】）。而 2022 年後俄羅斯與北約間仍處螺旋模式，雙方為防止俄烏戰事擴大，形成僵局（國家安全情境【III】）；芬蘭、瑞典更因擔憂俄羅斯戰事擴及己身，為尋求集體安全，芬蘭於 2023 年 4 月 4 日、瑞典於 2024 年 3 月 7 日分別加入北約，這恐將也是讓安全困境越發嚴重的一個節點，因此烏克蘭、北約歐洲國家對於如何結束俄烏戰事的劇本也就迥然相異，各懷不同的想法（請見圖 3）。

一、俄羅斯與北約的安全困境

（一）蟄伏的安全困境：1991 年至 2004 年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於 1991 年至 1999 年間在葉爾欽的領導下，初期實施震撼療法，並且希望全面改善和發展西方國家的關係，期待獲得大量經濟援助，並與西方結成戰略聯盟，外交政策施行大西洋主義，全面走向西方。1993 年 12 月，葉爾欽在 10 月砲轟國會後，俄羅斯舉辦第一次的國家杜馬選舉，親西方的民主改革派慘敗，極端民族主義和傾向共產黨的黨派獲勝，因此從 1994 年起俄羅斯逐漸改變親西方政策，1996 年 1 月葉爾欽任命普利馬可夫（Yevgeny Primakov）為外交部長，俄羅斯改為全方位外交政策，標榜捍衛俄羅斯國家利益，改變對西方國家一直讓步的局勢，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努力成為多極體系的一極，同時擴大對中東歐和前蘇聯加盟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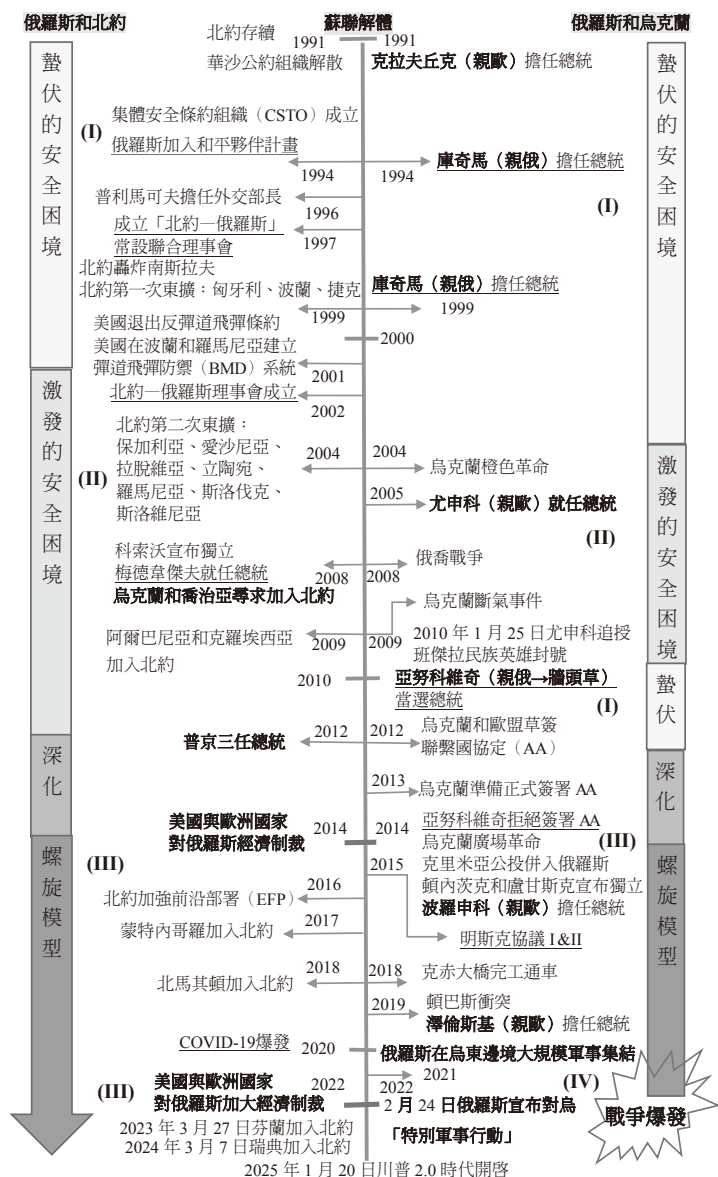


圖 3 俄羅斯、北約、烏克蘭雙安全困境和調節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底線處代表緩解安全困境調節因素；其餘代表增強安全困境調節因素。

國的影響力。⁸ 因此從 1996 年起，俄羅斯與中東歐國家關係開始密切接觸，高層互訪頻繁，政治和經濟合作不斷深入。雖然 1999 年北約第一次東擴，波蘭、匈牙利和捷克順利加入北約，但由於俄羅斯仍陷於 1998 年金融危機的經濟泥淖中，無力干涉此三國的意願，雖然極力表達抗議，但是中東歐國家紛紛表達與俄羅斯發展關係的意願，並強調加入北約不針對莫斯科。

2000 年普京當選總統，國家經濟徘徊低谷，普京將優先發展俄羅斯經濟確定為俄羅斯的基本國策，因此採取「實用主義，經貿至上」外交策略，希望與西方展開合作。2001 年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俄羅斯視此為打破自科索沃事件後美俄關係停頓狀態的契機，而以支持美國反恐來換取美俄關係的穩定發展。

但是，隨著蘇聯解體，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於 1991 年 7 月解散，聯合國地位更為鞏固，再加上原先的「歐洲合作暨安全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在 1995 年改組為「歐洲合作暨安全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北約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但如此一來，美國就會失去一個對歐發揮影響力的重要組織機制。因此，自 1991 年華沙公約組織解散後，北約在美國力挺之下仍舊維持一定的影響力，北約國家又重新界定了該組織的角色，將它擴張到較政治性的層面。1994 年起，非北約的歐洲國家及前華沙公約之會員國，全都受邀加入「和平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計畫，俄羅斯也在其中。北約與俄羅斯於 1997 年在巴黎簽署協定，成立「北約—俄羅斯」常設聯合理事會（NATO-Russia Permanent Joint Council, NRPJC），⁹ 主要目的是為了安撫俄羅斯對北約計畫東擴的強

8. 從 1999 年開始，普利馬可夫任總理期間推動俄羅斯、中國、印度組成「戰略三角」，以制衡美國。

9. 事實上，這個協定也僅授予俄羅斯諮詢顧問的角色而已。

烈反對，緩和北約與俄羅斯的對抗局面，讓俄羅斯對接下來 1999 年北約的第一次東擴，勢力進入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不那麼倍感威脅。

1998 年，塞爾維亞開始鎮壓科索沃，1999 年初，北約諸國在美國的推動下開始轟炸南斯拉夫。這個沒有經過安理會同意的軍事行動，因其迅速有效，竟未受到質疑。正當科索沃烽火連天之際，北約也在華府舉行 50 週年慶，會中通過了大西洋聯盟的「新戰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杭士基〔Chomsky〕，2000/2002：30）。很明顯地，「新戰略概念」是合理化北約「續存」的正當性，其目的就是要將北約轉變為幾乎獨立的安全機構，可自行採取軍事行動，甚至包括在歐美大西洋地區（許菁芸、宋鎮照，2013：69-71）。

2000 年普京表達希望北約邀請俄羅斯加入的意願，但北約回應必須申請（Rankin, 2021）。2002 年成立「北約—俄羅斯理事會」（NATO-Russia Council, NRC），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和軍事合作。

總而言之，1991 年至 1998 年，北約的存續雖然造成了俄羅斯對北約的意圖不確定的國家安全危機感，但是此時北約沒有擴張，而俄羅斯此時的外交政策偏向與西方交好，雙方在主觀和客觀的國家安全利益上是可以相容的（國家安全情境【I】）。1999 年北約第一次擴張（三國），俄羅斯無力阻止，因此在國家安全利益衝突上，主觀安全利益雖不相容、客觀利益相容，但是雙方沒有意圖，因此雖有安全困境，卻是激發的安全困境（國家安全情境【II】）。

（二）激發與深化安全困境：2001 年至 2014 年

2001 年，在促進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成立的同時，時任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在 2001 年至 2002 年單方面宣布退出與俄羅斯的《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隨後美國與波蘭和羅馬尼亞（在北約的支持下）簽署了雙邊協議，在其領土上建立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下文皆以 BMDS 稱之）（Goldgeier & Shiffrinson, 2023: 145-152），美國的

防禦性軍事作為和不明確的意圖顯然違背俄羅斯的意願，蟄伏的安全困境轉變為激發的安全困境。

由於 2003 年尤科斯（Yukos）事件、¹⁰ 2003 年喬治亞（Georgia）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¹¹ 2004 年的別斯蘭（Beslan）人質事件¹² 和 2004 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¹³ 西歐與

10. 因應國際油價上升，普京為打擊國內寡頭，並將國內私有化的石油公司收歸國有，首先拿尤科斯公司（Yukos Oil Company）開刀。尤科斯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2003 年 6 月被捕入獄。2003 年 12 月，尤科斯公司被宣布為拖欠稅款的公司，並被要求向俄羅斯聯邦政府支付罰金，2004 年 12 月尤科斯公司將其主要子公司尤甘斯克石油（Yuganskneftegaz）轉讓給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2006 年 8 月 1 日尤科斯公司被法院宣告破產。2010 年尤科斯公司於歐洲人權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HR）正式向俄羅斯政府提出訴訟。

11. 2003 年喬治亞的「玫瑰革命」是 2003 年 11 月在喬治亞發生的反對當時總統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及其所領導政府的一系列示威活動，其領導人反對黨領袖薩卡什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每次公開露面都拿一枝玫瑰花，因此被稱為玫瑰革命。最終，薩卡什維利領導的反對黨獲得了勝利，當選喬治亞總統，建立了民主選舉的政府，而原總統謝瓦納茲辭職。在 2004 年 3 月 28 日進行的喬治亞議會選舉中，薩卡什維利領導的政黨獲得全部 150 個議席。

12. 別斯蘭人質事件是指 2004 年 9 月 1 日，車臣分離主義武裝分子在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學校製造的一起劫持學生、教師和家長作為人質的恐怖活動，到 2004 年 9 月 3 日事件結束，共造成了 326 人死亡，在俄羅斯國內造成很大影響，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普京指出，恐怖分子在別斯蘭市製造的人質事件是滅絕人性的，其殘忍史無前例。這是對整個俄羅斯、整個民族的挑釁，是對整個國家發動的進攻。而美國在象徵性地譴責恐怖分子的同時，卻表示不排除與車臣持不同政見者繼續接觸的可能，建議俄羅斯與車臣分裂主義人士談判和妥協，引起了俄羅斯強烈的不滿。

13. 橙色革命係指 2004 年至 2005 年圍繞 2004 年烏克蘭總統大選過程中由

美國皆與莫斯科當局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立，甚至干預與譴責俄羅斯漠視人權（心理調節因素），而讓普京在第二任期外交方向產生了轉變，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陷入停滯。

2004 年北約第二次東擴，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維尼亞在 2004 年伊斯坦堡峰會上加入北約（物質調節因素），俄羅斯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加入感到特別不安，這是第一批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國家。俄羅斯軍隊早在蘇聯解體後就已駐紮在波羅的海（Banka, 2019），但當時加入歐盟和北約對波羅的海國家非常有吸引力，故就算俄羅斯反對，波蘭、捷克和匈牙利也依舊加入北約。可以發現，北約東擴不斷壓縮到俄羅斯與西方世界國家的距離，從華沙公約時期，莫斯科與德國、捷克距離 2,000 多公里，到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後縮短為 900 公里，就已經觸動了俄羅斯的敏感神經。2008 年，烏克蘭和喬治亞也發表意願加入北約，俄羅斯則是強烈反對烏克蘭和喬治亞成為北約成員國的任何前景。¹⁴

於嚴重貪污、影響選民和直接進行選舉舞弊所導致的在烏克蘭全國所發生的一系列抗議和政治事件。在 2004 年 10 月 31 日的烏克蘭總統大選中，由於沒有任何候選人達到法律規定的 50% 多數，因此同年 11 月 21 日在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和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之間舉行重選。尤申科在選舉活動中使用橙色作為其代表色，因此這場運動使用橙色作為抗議的顏色。而此運動的標誌是橙色絲帶和一面寫有 Так! Ющенко!（對！尤申科！）的旗。迫於這些抗議運動，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布這次重選的結果無效，並規定在同年 12 月 26 日重複重選。第二次重選受到嚴格的觀察，烏克蘭國內和國際的觀察員均確認第二次重選基本上沒有任何問題。尤申科在這次重選中明顯以 52% 的結果獲勝；亞努科維奇獲 44%。2005 年 1 月 23 日尤申科就職總統，標誌著橙色革命的最終勝利。

14. 2022 年 2 月 21 日、24 日，普京對全民演講，均提到北約東擴對俄羅斯造成的威脅與不安全感，若北約挺進烏克蘭，那飛彈部署就離現在的距離更接近莫斯科。

2008 年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擔任總統，普京轉任總理。2008 年 8 月發生俄喬戰爭，俄羅斯正式承認阿布哈茲（Abkhazia）和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為獨立國家，美俄關係降至低點，9 月梅德韋傑夫修改外交政策，¹⁵ 重回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合作的道路，藉由與美國的修好，努力營造大國姿態，並持續加強與東方國家實質的合作，藉由經貿利益來加強國內基礎建設。歐巴馬於 2009 年 9 月宣布北約不在捷克和波蘭部署飛彈防禦部隊後，梅德韋傑夫表示，決定不在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爾（Iskander）導彈（物質調節因素）（Shchedrov, 2009），俄羅斯與北約關係開始些許緩和。

2009 年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加入北約（第三次東擴）、北約計畫在東歐部署導彈防禦系統¹⁶和 2012 年美國頒布《馬格尼茨基法案》（*Sergei Magnitsky Rule of Law Accountability Act*），¹⁷俄羅斯向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提供政治庇護、美俄無法彌合在敘利亞危機上的分歧，因此 2012 年普京在俄羅斯與西方摩擦加劇的背景下

15. 2008 年 8 月 31 日，梅德韋傑夫改變了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圍繞五個主要原則，統稱為梅德韋傑夫主義：1. 國際法的基本原則至高無上；2. 世界將是多極的；3. 俄羅斯不會尋求與其他國家對抗；4. 俄羅斯將保護其公民，無論他們身在何處；5. 俄羅斯將發展友好地區關係（Pacer, 2015: 120-123）。

16. 2007 年 4 月 19 日的布魯塞爾會議，北約便開始討論在歐洲部署 BMDS 的問題。會議中，成員國幾乎一致同意美國在東歐（波蘭和捷克）部署此一系統，而美國官員也在會中保證，只要 BMDS 部署完成，將能夠保護幾乎所有歐洲盟國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的領土。而且美國的 BMDS 與北約正在研製的 BMDS 是相容的，兩者合作能對歐洲安全發揮更全面的保護作用（蔡育岱、譚偉恩，2010：6-8）。

17. 2012 年，美國根據「馬格尼茨基名單」頒布《馬格尼茨基法案》，對俄羅斯近百名涉嫌與 2009 年俄羅斯律師馬格尼茨基死亡有關的俄羅斯官員實施制裁。

開始了第三個總統任期，此時美（北約）俄關係更加複雜，進入深入的安全困境。

總而言之，北約東擴和在中東歐國家部署 BMDS 是北約與俄羅斯安全困境深化的主要因素，即使表明對俄羅斯沒有意圖，俄羅斯卻也感受到對其防禦部署的威脅，而展開反制，雖然在梅德韋傑夫任期雙方安全困境有所舒緩，但是普京三任回歸後，標誌著俄羅斯鷹派的勝利，外交政策轉趨保守，整體的安全困境更加深化，此時一方（俄羅斯）認為北約已轉為惡意，因此俄羅斯也開始趨於惡意，客觀安全利益不能相容，但另一方（北約）卻認為主觀上可以相容，成為虛幻的相容性，此時已是在瀕臨螺旋模式的灰色地帶了（國家安全情境【III】）。

二、俄羅斯與烏克蘭之安全困境：1991 年至 2014 年

1991 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把自己的地緣政治周邊——前蘇聯國家視為其外交政策的最優先方向，1993 年 4 月 23 日，葉爾欽批准了新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主要任務是與「近鄰」（near abroad）國家建立穩定積極的關係，目的是克服蘇聯解體後在前蘇聯領土上的動盪與不穩定，又被稱為 1993 年「近鄰主義」（the Near Abroad Doctrine）。因此，1990 年代俄羅斯在外交上常使用「近鄰」一詞來稱呼前蘇聯國家；2008 年以來則改稱為「享有特權的利益關係國」（privileged interest）（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08）。普京曾於 2003 年國情咨文表示，俄羅斯視獨立國協為戰略利益範疇。在俄羅斯民眾與權力菁英的心中，還存在著「莫斯科對於後蘇維埃國家仍握有特殊權利」的想法，這表明俄羅斯想要將其勢力範圍遍及整個歐亞大陸（許菁芸，2022：56-63）。鑑於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占據的廣闊空間、兩國之間悠久而複雜的歷史、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之間的文化聯繫及自蘇聯時代結束以來一直持續的經濟關係，俄羅斯尋求在後蘇聯

空間的烏克蘭建立勢力範圍，這是非常符合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利益。

1991 年烏克蘭獨立後，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基輔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在與西方和與俄羅斯關係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一直是烏克蘭外交政策的核心挑戰。歷任烏克蘭領導人無論是親歐或親俄，都在尋求雙管齊下：發展與美國、歐盟和北約的關係，同時努力與俄羅斯保持穩定的關係。但是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一直以來都是俄羅斯重視的戰略要地，烏克蘭親歐會使俄羅斯失去對歐的緩衝區，影響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因此兩國之間的安全困境是從蘇聯解體後就一直存在。

1991 年 12 月 5 日烏克蘭選出第一位總統——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任期 1991-1994），採取親歐立場，發展與西方的關係，並與歐盟簽署合作協議。他認為烏克蘭安全的最佳保障就是加入北約，也極力贊成北約東擴。在克拉夫丘克的領導下，由於與蘇聯時代工業私有化相關的腐敗猖獗，烏克蘭經濟陷入衰退。

1994 年烏克蘭舉行總統大選，第二任總統庫奇馬（Leonid Kuchma，任期 1994-2005），其競選綱領是透過恢復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和更快的親市場改革來提振經濟。因此，庫奇馬在擔任總統期間，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係開始改善。又，庫奇馬採取了「多面向」（multi-vector）的外交政策，同時展開與俄羅斯、歐洲和美國之間的外交。1996 年，烏克蘭將所有蘇聯時代的核子彈頭轉移到俄羅斯。1997 年，烏克蘭和北約同意建立獨特的夥伴關係。1997 年 5 月，烏克蘭和俄羅斯締結條約，明確承認基輔長期以來尋求的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並解決了俄羅斯黑海艦隊駐克里米亞的問題。在 1990 年代，平衡的外交政策對庫奇馬和烏克蘭來說是成功的。但是，在庫奇馬因陷入腐敗醜聞而國內外聲望下降後，他開始轉向俄羅斯作為他的忠誠盟友。

2004 年烏克蘭發生「橙色革命」，之後親西方的尤申科（任期 2005-2010）總統上臺，2005 年 8 月，尤申科與喬治亞總統薩卡什

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共同簽署了《博爾若米宣言》（*Borjomi Declaration*），呼籲建立一個國際合作機構——民主選擇共同體（Community of Democratic Choice），將波羅的海周邊地區的民主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聚集在一起。他強力主張烏克蘭加入北約，並在 2008 年尋求加入北約，反對以俄語作為烏克蘭的第二官方語言（Klussmann & Neef, 2009）。2008 年 1 月尤申科發起加入北約的申請，幾週後，普京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記者會上站在尤申科身旁，平靜地威脅要將核子飛彈瞄準烏克蘭（Harding, 2008）。2008 年俄喬戰爭期間，俄烏關係開始惡化，原因是烏克蘭支持喬治亞，俄羅斯聲稱烏克蘭向喬治亞提供武器。

亞努科維奇（任期 2010-2014）於 2010 年 2 月就任烏克蘭第四任總統，其內政與外交政策展現出「平衡主義」的特徵，試圖在親俄與親歐之間取得平衡。亞努科維奇政府於 2010 年通過《對內對外政策基本原則法》（*On Basic Principle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正式確立烏克蘭的非結盟地位，放棄加入北約的計畫，並延長俄羅斯黑海艦隊在克里米亞的租期，強化與俄羅斯的關係（Roudik, 2010）。但是其在迴避加入北約的同時，也在尋求和歐盟建立合作關係。2012 年烏克蘭和歐盟草簽聯繫國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下文皆以 AA 稱之），2013 年烏克蘭預備簽署 AA，同年 8 月，俄羅斯禁止所有烏克蘭產品進口；9 月，俄羅斯警告烏克蘭，如果烏克蘭繼續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將面臨金融災難，甚至可能導致國家崩潰。2013 年 11 月 21 日，亞努科維奇暫停了簽署歐盟聯繫國協定的準備工作，轉而遞交申請以觀察員國身分加入俄所主導之「歐亞經濟聯盟」。2013 年 12 月 17 日，普京同意向烏克蘭提供 150 億美元的財政援助及天然氣價格 33% 的折扣。2013 年底，烏克蘭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運動，後來演變成 2014 年的廣場革命。2014 年廣場革命爆發之際，亞努科維奇向俄羅斯請求軍隊協助鎮壓。2014 年 2 月，亞努科維奇以訪問哈爾科夫市為由離開基輔並

叛逃至俄羅斯莫斯科（Frizzell, 2014）。

綜而言之，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和烏克蘭皆成為獨立國家，烏克蘭自 1991 年獨立以來，烏西和烏東的分歧和菁英衝突一直是烏克蘭國內無法有效解決的難題，而成為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的政治角力場，導致顏色革命外，也因總統的親西方和親俄立場與外交政策（請見表 2），在各總統任內造成俄烏雙方安全困境的轉變（蟄伏→激發→蟄伏→深化），國家安全情境也隨之轉變（【I】→【II】→【I】→【III】）。在蘇聯解體初期，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是採取親西方立場，葉爾欽也是採取親西方立場，後來接任的庫奇馬轉向親俄，兩國雖然無法確定彼此當前或未來的意圖，但是雙方在主觀和客觀的國家安全利益上可以相容（國家安全情境【I】），之後，親西方總統尤申科上臺，俄羅斯開始以經濟、能源干涉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盟的意圖，由於俄方對烏方領土尚無惡意，主觀安全利益雖不相容，客觀利益相容（國家安全情境【II】）。2010 年在位之亞努科維奇本來就是俄羅斯扶植的親俄總統，所以雙方又回復到主觀和客觀的國家安全利益上可以相容（國家安全情境【I】）。2012 年烏克蘭和歐盟草簽 AA，2013 年烏克蘭預備簽署 AA，俄羅斯開始出現惡意，2014 年亞努科維奇為緩和莫斯科的惡意，突然拒絕簽署 AA，俄烏兩方在客觀安全利益不能相容，主觀上仍可以相容（烏克蘭忍耐），俄烏之間的關係已成為虛幻的相容性，也就是灰色地帶，直至民眾大規模抗議，廣場革命爆發，俄羅斯軍隊進入克里米亞後（惡意），俄羅斯和烏克蘭才進入螺旋模式（國家安全情境【III】）。

表 2 烏克蘭歷任總統屬性與外交政策

總統	任期	屬性	外交政策
克拉夫丘克	1991-1994	親西方、親歐	與歐盟簽署夥伴關係協議；歡迎北約東擴的想法；與俄羅斯關係緊張；自願放棄核武，以換取安全保障；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
庫奇馬	1994-2005	親俄→多面向	加強恢復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與俄羅斯簽署《友好、合作與夥伴關係條約》；將俄語訂為「官方語言」；與北約簽署特殊夥伴關係協議；採取「多面向」的外交政策，同時接觸俄羅斯、歐洲和美國。
2004 年橙色革命			
尤申科	2005-2010	親西方	申請加入歐盟與北約組織、支持喬治亞對俄羅斯政策；2010 年選前強推與歐盟的整合；反對以俄語作為烏克蘭的第二官方語言。
亞努科維奇	2010-2014	平衡→親俄	正式確立烏克蘭的非結盟地位，放棄加入北約的計畫，並延長俄羅斯黑海艦隊在克里米亞的租期；表明不尋求加入北約，但尋求和歐盟建立合作關係；2013 年卻因為俄羅斯的威脅利誘，暫停與歐盟簽署 AA，轉而遞交申請俄所主導之「歐亞經濟聯盟」觀察員國，之後民眾抗議，釀成廣場革命。
2014 年廣場革命			
波羅申科 (Petro Poroshenko)	2014-2019	親西方、親歐	與歐盟簽署聯繫協定、持續推動加入歐盟與北約計畫；烏克蘭語是烏克蘭唯一的官方語言。
澤倫斯基	2019- 迄今	折衷→反俄、親西方、親歐	2019-2020：專注於與莫斯科達成「諒解」(understanding)，希望解決俄羅斯支持的烏東分離主義運動，並希望以諾曼第模式解決烏東問題，重申頓巴斯停火承諾。 2020- 迄今：其人民公僕黨在 2020 年 10 月地方選舉中慘敗，2022 年俄烏戰爭後極度反俄，希望烏克蘭儘快加入歐盟和北約；譴責哈瑪斯，支持以色列及其自衛權。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楊三億（2020：83）和上述分析綜合整理製作。

三、俄羅斯、烏克蘭、北約：2014 年同時交錯進入螺旋模式

嚴格來說，俄烏戰爭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衝突的持續惡化所導致，始於 2014 年 2 月頓巴斯衝突中與烏克蘭軍隊作戰，同年 3 月 18 日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因此，於 2014 年俄羅斯與北約、俄羅斯與烏克蘭同時進入螺旋模式。

（一）2014 年克里米亞公投和頓巴斯戰爭

2014 年初，親歐盟示威抗議引發了廣場革命，導致烏克蘭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下臺，並逃往俄羅斯。不久之後，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爆發親俄騷亂，而俄羅斯軍隊進入了克里米亞。經過 2014 年 3 月 16 日一場備受爭議的公投後，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2014 年 4 月，俄羅斯支持的武裝分子占領了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城鎮，並宣布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為獨立國家，頓巴斯戰爭爆發。分離主義者得到了俄羅斯大量但祕密的支持，烏克蘭完全奪回分離主義分子控制地區的嘗試失敗。儘管俄羅斯否認參與，但卻派遣軍隊支援。

1. 克里米亞公投併入俄羅斯

2014 年 2 月下旬，俄羅斯開始占領克里米亞，標誌著俄烏戰爭的開始。2 月 22 日至 23 日，在亞努科維奇被驅逐後的相對權力真空時期，俄羅斯軍隊和特種部隊被轉移到克里米亞邊境附近。2 月 27 日，沒有徽章的俄羅斯軍隊（俗稱小綠人）開始占領克里米亞。俄羅斯始終否認這些士兵隸屬俄羅斯，而是聲稱他們是當地的「自衛」部隊。小綠人占領了克里米亞議會和政府大樓，並設立檢查站來限制行動，同時切斷克里米亞半島與烏克蘭其他地區的聯繫，之後占領了機場和通訊中心，並封鎖了烏克蘭軍事基地，例如南部海軍基地。俄羅斯網路攻擊關閉了與烏克蘭政府、新聞媒體和社群媒體相關的網站。3 月 1 日，俄羅斯議會批准在克里米亞使用武裝部隊。

俄羅斯特種部隊占領克里米亞議會的同時，解散了克里米亞政府，建立親俄政府，並宣布就克里米亞地位將於 2014 年 3 月 16 日進行全民公投。據俄羅斯當局稱，公投結果顯示 96.77% 的人民支持加入俄羅斯。3 月 18 日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3 月 24 日，烏克蘭下令剩餘部隊撤出；3 月 30 日，所有烏克蘭軍隊均已撤離克里米亞。

4 月 15 日，烏克蘭議會宣布克里米亞為俄羅斯暫時占領的領土。併吞克里米亞後，俄羅斯政府將半島軍事化並發出核威脅。普京表示，俄羅斯將在克里米亞設立軍事特遣部隊。11 月，北約表示相信俄羅斯正在克里米亞部署核武。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併入後，北約成員國（美國、英國）開始為烏克蘭軍隊提供訓練（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2）。

2. 頓巴斯戰爭和《明斯克協議》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後，在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頓內茨克及盧甘斯克）的親俄人士舉行公投，宣布組成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當局與烏克蘭正規軍爆發武力衝突，同年 9 月，由烏克蘭問題三邊聯絡小組，烏克蘭、俄羅斯和歐洲合作暨安全組織的代表組成發起，和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頓內茨克前領導人札哈爾琴科（Alexander Zakharchenko）、盧甘斯克前領導人普洛特尼茨基（Igor Plotnitsky）共同簽署停火協議《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由德國、法國監管協議執行。《明斯克協議》的主要目的為落實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地區雙邊停火，並在烏克蘭憲法框架下賦予其自治權。但由於《明斯克協議》成效不彰，衝突仍舊不斷，2015 年 2 月，俄羅斯和烏克蘭為解決衝突，簽署了《明斯克二號協議》（*Minsk II*），但在隨後的幾年裡從未充分實施。頓巴斯戰爭最終演變為烏克蘭與俄羅斯及分離主義勢力之間的一場暴力但靜態的冷衝突（frozen conflict），多次短暫開火，沒有持久和平，但領土控制也幾乎沒有變化。然而，自協議簽訂以來，烏克蘭駐紮當地的「亞速營」（Azov Battalion）和「頓巴

斯營」(Donbas Battalion)、¹⁸政府軍與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地區民兵組織雙方仍舊衝突不斷，已超過 15,000 人喪生。

(二) 2014 年至 2021 年俄羅斯、北約、烏克蘭緊張局勢螺旋直上

2014 年至 2021 年俄羅斯、北約和烏克蘭間的物質和心理調節因素皆是在螺旋模式中加劇戰爭的威脅。下面就俄羅斯、北約和烏克蘭間較重要的物質和心理調節因素做一說明。

1. 北約加強中東歐軍事防備與東擴

自 2014 年 3 月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並介入烏克蘭東部衝突以來，北約在政治與軍事層面上進行了重大調整，烏克蘭對北約的依賴與期望也隨之升高。北約於同年 4 月 1 日宣布暫停與俄羅斯的所有實質性民用與軍事合作，並凍結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的運作(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6a)。在 2014 年威爾斯峰會及 2016 年華沙峰會上，北約進一步指出俄羅斯的挑釁性軍事活動和使用武力的意願對區域穩定構成威脅，並損害了歐洲一大西洋地區的安全，這反映出北約對俄羅斯政策的全面轉向(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6b)。

在 2014 年威爾斯峰會上，北約為應對俄羅斯非法併吞克里米亞及其對東歐安全的威脅，啟動了「即時行動計畫」(Readiness

¹⁸2015 年，俄羅斯政府將亞速營列入恐怖組織名單。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報告中指出，「亞速營」和「頓巴斯營」(後遭烏克蘭解散)的八名至 10 名成員在烏東武裝衝突時涉嫌參與包括搶劫、非法拘禁、強姦及酷刑在內的罪行。亞速營因早期和據稱持續與極右團體和新納粹意識形態的聯繫、使用與納粹主義有關的爭議符號及該單位成員參與侵犯人權的指控而引起爭議，於 2014 年 11 月 11 日正式編入烏克蘭國家衛隊(National Guard of Ukraine)。俄羅斯經常使用「亞速」作為據稱在烏克蘭占主導地位的新納粹主義的象徵。

Action Plan, RAP)，強化東翼防禦的部署，該計畫的一項核心措施是成立「非常備前線部隊」（Very High Readiness Joint Task Force, VJTF），作為「北約快速反應部隊」（NATO Response Force, NRF）中的「矛頭部隊」（spearhead force），以提升對東歐成員國的快速反應能力（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5）。2015年6月下旬，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在訪問愛沙尼亞時表示，美國將在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和羅馬尼亞部署重型武器，包括坦克、裝甲車和大砲，此舉被解讀為標誌著北約戰略重新定位的開始。2016年5月，北約飛彈防禦系統（NATO missile defence system）第一個基地在羅馬尼亞德韋塞盧（Deveselu）啟用，第二個基地建於波蘭，俄羅斯認為此舉是對俄的直接威脅（Kramer, 2016）。2016年6月，俄羅斯的列瓦達中心民調顯示，68%的俄羅斯人認為在與俄羅斯接壤的前中東歐國家部署北約軍隊對俄羅斯構成威脅（Smeltz et al., 2016）。

2016年華沙峰會上決定加強北約在聯盟東部地區的軍事存在，北約宣布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部署由美、英、德、加等成員國主導的多國營級戰鬥群（Enhanced Forward Presence, eFP），並同時重建部分冷戰時期裁撤的指揮架構，包括在波蘭與羅馬尼亞新設聯合司令部。2017年6月5日蒙特內哥羅加入北約、2020年3月27日北馬其頓加入北約。¹⁹ 2019年烏國現任總統澤倫斯基上臺後，即通過國會修憲，確立加入歐盟及北約的方針。

此外，中俄兩國加強合作也引起北約的區域安全意識。2021年12月2日，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宣稱中俄關係「不是盟友勝似盟友」、「背靠背的戰略協作」、「合作關係不封頂」；新聞報導指出，2月4日普京出席備受西方國家抵制的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

¹⁹2023年4月4日芬蘭加入北約、2024年3月7日瑞典加入北約，今（2025）年北約成員國已達32國。

幕式，並與習近平高調發表「中俄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稱「兩國友好沒有止境」。中俄皆反對北約擴張，也想竭力阻止美國勢力擴張至東歐、亞太地區，尤其是經濟和軍事，而中俄關係的進一步親近，也給予北約對俄羅斯發動俄烏戰爭的野心更加確認。

2. 俄羅斯輕視與低估態度：2019 年澤倫斯基當選總統對俄政策搖擺與 2020 年至 2021 年美國正式自阿富汗撤軍

在烏克蘭方面，自 2019 年澤倫斯基當選烏克蘭總統後，對俄政策一直受到其為烏克蘭帶來和平的競選承諾所驅動，因此執政初期，與普京親自達成協議是澤倫斯基對俄政策的精髓。澤倫斯基的政治素人背景與初期親俄寡頭的影響，使其專注於與莫斯科達成「諒解」，逐漸削弱了在烏克蘭的政治地位，也使得莫斯科想以強勢的態度令其屈服，而不是透過談判達成妥協。而澤倫斯基也因為政府無能、任人唯親和腐敗而受到嚴厲批評，烏克蘭與西方的關係搖搖欲墜，政府的對俄政策收效甚微，2020 年至 2021 年平均只有 18.6% 的烏克蘭人希望澤倫斯基競選連任（Київський Міжнародний Інститут Соціології, 2022）。

自澤倫斯基上任以來，在有關頓巴斯的聲明中完全避免直接提及「俄羅斯侵略」。2019 年 6 月 4 日，澤倫斯基宣布烏克蘭準備履行《明斯克協議》並與俄羅斯舉行和平談判。之後，澤倫斯基似乎將頓巴斯衝突持續的責任歸咎於烏克蘭前領導階層，並且出於天真或自信，他似乎相信自己能夠更有效地與莫斯科進行談判，然而 2019 年 12 月 9 日舉行的諾曼第四國峰會並未滿足澤倫斯基的期望（Moshes, 2019）。2020 年起，澤倫斯基在烏克蘭國內政治中的操控權逐漸降低，其組織之人民公僕黨（Слуга народу）在 2020 年 10 月地方選舉中慘敗，同時，俄羅斯對澤倫斯基的態度也急轉直下，因其支持度逐漸低落無法與俄羅斯「妥協」，且其政治上日益脆弱，導致莫斯科開始明確地凍結與烏克蘭政府間的聯繫，俄羅斯暫停了外交部層級的談

判進程，實際上是抵制了「諾曼第四國」機制（Moshes & Nizhnikau, 2022）。2022 年 2 月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前的支持率從 2019 年 9 月的 73% 降至 24%（Соціологічна Група Рейтинг, 2022）。普京在 2022 年開戰前夕，無論在政治上或外交上都輕視和低估了澤倫斯基。

此外，2022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後，美國對拜登出現批評聲浪，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促使了俄羅斯決定在 2022 年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攻擊。2022 年 3 月，美國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聲稱，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促使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誘因，如果美國沒有從阿富汗「急忙逃跑」（cut and run），普京就不會試圖入侵烏克蘭（Bernstein, 2022）。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Nikki Haley）在 2023 年 6 月愛荷華州舉行的 CNN 市政廳會議上也重申了此一說法，並將普京的侵略行為歸咎於拜登無序地從阿富汗撤軍（Krieg & Bradner, 2023）。但提出這說法的不僅是共和黨政客，美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希爾（Fiona Hill）也認為，「美國倉促撤出阿富汗」在普京眼中表明了美國的軟弱（Tepperman, 2022）。撤離阿富汗的決定似乎只是美國長期拋棄其合作夥伴的最新例證，況且在普京出兵之前，美國似乎沒有要軍事投入的表態（Wolf, 2022），因此普京的結論是，美國當局也會對烏克蘭採取同樣的做法。

3. 俄羅斯在烏克蘭周邊的軍事集結與言論（2021 年至 2022 年）

2021 年俄羅斯軍隊分別於 1 月、4 月、11 月在靠近烏克蘭邊境地區進行超過 10 萬人之大規模軍事集結。12 月，俄羅斯向美國和北約提出安全保障條約草案，全名為《俄羅斯聯邦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安全措施協定》（Russia's Draft "Agreement on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Member Stat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主要有三點要求：(1) 要求北約停止東擴（特別是烏克蘭和喬治亞）；(2) 要求北約撤除在烏克蘭和東歐地區的軍事部署；(3) 移除有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

武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1）。2022 年 1 月 9 日至 10 日美俄於日內瓦舉行戰略談判，美國與北約皆不予以不東擴的保證，並表示「只有烏克蘭和 30 個北約盟國才能決定烏克蘭何時準備加入北約。俄羅斯沒有否決權，俄羅斯沒有發言權，俄羅斯無權建立勢力範圍試圖控制他們的鄰居」（Basu, 2021）。

在特別軍事行動的前幾個月，俄羅斯官員指責烏克蘭煽動緊張局勢、仇俄情緒並壓制講俄語的人。普京在 2022 年 2 月 21 日的電視演講中，質疑烏克蘭國家的合法性，重申了「烏克蘭從來沒有真正建國的傳統」的說法。普京指出列寧在俄羅斯土地上建立了一個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從而創建了烏克蘭，而赫魯雪夫「出於某種原因從俄羅斯手中奪走了克里米亞，並將其交給了烏克蘭」。普京聲稱烏克蘭社會和政府由新納粹主義主導，援引了二戰期間德國占領烏克蘭的合作歷史，並呼應反猶太主義陰謀論，表示烏克蘭確實有極右邊緣，包括與新納粹有聯繫的亞速營和右翼部門（Waxman, 2022）。

自 2022 年 2 月 17 日起，頓巴斯的戰鬥急劇升級。烏克蘭和親俄分離主義者互相指責對方發動攻擊。澤倫斯基則公開表達俄羅斯極有可能入侵烏克蘭；北約以俄羅斯入侵為由，決定向烏克蘭提供額外軍事援助，並在波蘭和羅馬尼亞部署兵力。

2014 年俄羅斯、北約、烏克蘭關係進入螺旋模式，而在國家安全情境上，俄羅斯和北約之間都沒有想要進入戰爭的意圖，因為雙方一旦戰爭，就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雖然俄羅斯和北約在客觀利益不相容，在主觀安全利益上是可相容，只要烏克蘭不加入北約（國家安全情境【III】）。但是對烏克蘭和俄羅斯而言，雙方已經是客觀安全利益和主觀安全利益都不相容（國家安全情境【IV】）。普京認為前蘇聯國家加入北約是俄羅斯國家安全的最終底線，普京對白俄羅斯、烏克蘭兩國一直有某種民族情感，認為東斯拉夫三國應團結一致。然自 2004 年烏克蘭顏色革命或 2014 年克里

米亞事件，直至今日烏克蘭加入北約等主張，都不斷地在挑戰俄羅斯容忍的底線，是故俄羅斯急需新的緩衝地帶來隔開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邊界，減少俄羅斯土地與北約成員國土地接壤的面積，才會承認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獨立，並「受邀」進入該二國進行特別軍事行動。筆者認為，俄羅斯與北約的安全情境（【III】），與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安全情境（【IV】）不同調，導致烏克蘭和北約（尤其是歐洲國家）所想要的終局劇本不同。

伍、結論

戰爭持續至今，烏克蘭、北約和俄羅斯如何定義「俄烏戰爭」的終局和可能的勝利？儘管西方武器裝備不斷輸入烏克蘭，但烏克蘭透過武力反攻，奪回所有失去領土的可能性仍然很低。迄今俄烏雙方都無法在戰略上或戰術上，具有相對優勢所需的軍事主導地位，形成寸土之爭的拉鋸戰。對於戰爭，烏克蘭、北約和俄羅斯所想要的劇本皆有不同。

對於烏克蘭而言，其希望的兩套劇本如下：第一套劇本要求烏克蘭收復全部失土，並從莫斯科獲得對戰爭造成的損失予以賠償，而俄羅斯領導人（普京）則因戰爭罪和侵略罪接受審判；第二套劇本寄望於俄羅斯的政權更迭，包括國家崩潰和領導人的更迭。烏克蘭認為如果莫斯科政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和平是不可能的。

而西方盟友的劇本又與烏克蘭有部分相異，烏克蘭的西方盟友（以北約和周邊歐洲國家為代表）認為戰爭的結果直接關係到其本國自身的安全，而且雙方的安全情境（【III】）並沒有一定會導向戰爭，反之，必須避免以後可能的戰爭。

西方盟友的核心目標是：一、使烏克蘭能夠迫使俄羅斯從盡可能的領土上撤退；二、確保俄羅斯在衝突結束後不會意圖向其他地方發動攻擊；三、削弱莫斯科的軍事力量，使其即使有這種傾向，也很難再做類似入侵烏克蘭的事情；四、避免俄羅斯與北約成員國之間的

直接軍事對抗。

而在俄羅斯方面，目前烏東四州已併入俄羅斯，要改變這個事實非常困難。俄羅斯希望的劇本是：一、俄羅斯在烏東的控制區域（克里米亞和烏東四州）永久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二、烏克蘭維持中立化，不加入北約和歐盟；三、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四、全面解除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隨著 2024 年戰局的僵持，美國和北約盟國似乎對允許烏克蘭軍隊使用西方提供的遠程武器系統打擊俄羅斯軍事目標的可能性越來越持開放態度，基輔則公開敦促。2022 年 2 月 24 日，莫斯科宣布特別軍事行動之後，普京隨即宣布如果西方國家介入協助，俄羅斯不惜動用核武部隊，藉以抑制北約盟國的後援力量。此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盟國雖援助烏克蘭相關軍事武器裝備，但是，華盛頓十分明確地表達不可用以跨境攻擊俄羅斯本土，因為莫斯科表達此為俄羅斯的戰略底線，並威脅使用核武部隊，引發歐陸本土核武大戰的安全困境問題。因此，普京於 2024 年 9 月 12 日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大廳舉行的聯合文化論壇上發表演說後表示，取消對烏克蘭使用遠程西方飛彈襲擊其國家腹地的限制，將被視為戰爭行為，「這將意味著北約國家——美國和歐洲國家——正在與俄羅斯交戰」（Акопов, 2024）。北約與俄羅斯的僵局，當時正是隨時可能由國家安全情境【III】進入【IV】的關鍵時刻。

2025 年 1 月 20 日，川普正式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在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思維上，新政府一改前任總統拜登大力援烏的政策路線，解決俄烏戰事方面態度強硬，手段包括直接減少對烏援助、敦促停火談判、提出烏克蘭可以用其 50% 的稀土礦產作為美國對其提供援助的「補償」和對未來安全的保障²⁰（Baskaran & Schwartz,

²⁰雖然美國並不承諾未來對烏克蘭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國未來要開挖烏克蘭礦產，即有機會派保安人員進入，也可視為間接的安全保障。

2025）。與此同時，歐洲對俄烏戰爭的態度在川普上任後發生了微妙變化，川普上任後對俄羅斯釋出善意、與普京進行通話、在沙烏地阿拉伯進行美俄會談，都讓歐洲感到背叛和焦慮，也讓其意識到必須轉變過度依賴美國的外交態度。川普利用北約的安全保障（將不履行第五條款）來要求歐盟在其他政策上的讓步，川普更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預算提高至 GDP 的 5%，²¹ 更加深化美國與歐洲的不信任感（Therrien & Gardner, 2025），北約的內部開始分化。因此，面對烏克蘭情勢日益不利的現實，歐洲國家開始認知到，若缺乏實質加強支援，俄羅斯勢必會在戰場上取得更全面的優勢，歐洲各國不斷加碼軍事與經濟援助，組成以英、法為首的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維護烏克蘭的安全，以延緩俄軍推進、維持烏克蘭抵抗力量，甚至牽制俄羅斯的戰略擴張（Liboreiro, 2025）。歐洲此舉不僅反映對俄羅斯戰略意圖的深層憂慮，也反映出歐洲國家與俄羅斯安全困境的加劇。

在烏克蘭方面，澤倫斯基於 2025 年 2 月 28 日在白宮與川普和范斯（J. D. Vance）的世紀爭吵後，於 3 月 11 日在吉達重啟的會談中，同意美方提出的 30 日停火協議，並重新協商礦產協議，而筆者認為，烏克蘭在戰場劣勢下對「有條件停火」的務實考量，其主要目的在於爭取重整時間並避免倉促簽署不利條件的協議。俄羅斯則反之拒絕停火，加強對烏轟炸攻勢，對俄烏停戰協議採取拖延戰略，希望消耗川普耐心，因為普京認為，當前川普執政下，他可以將烏克蘭逼入更不利的位置，並在華府的幫助下，說服基輔及其歐洲盟友接受以俄羅斯條件為基礎的和平協議，固化占領成果與合法性，並試圖以和平協議約束烏克蘭反攻能力。而川普為了達成其選前停戰的承諾，基於其與普京意識形態較相近（極右派民族主義）和私交較好，因此俄

21. 目前波蘭的國防預算占比最高，2024 年已超過 GDP 的 4%（Reuben, 2025）。

方更願意與美方制定雙贏的和平方案，很有可能犧牲烏克蘭的國家利益，以現況止戰。

觀察俄烏戰爭，可以發現導致北約、俄羅斯、烏克蘭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雙方往往採取自認為增加安全的措施，雖然是無意圖，例如積累不必要的進攻性能力，結果卻適得其反：更多的力量帶來更少安全。目前俄烏戰事僵持，雙方都已到達國家能力的邊緣，戰事的延續取決於西方（美國）是否能源源不斷供給烏克蘭軍事補給和武器，儘管烏克蘭是俄羅斯和北約國家間的緩衝國，平息戰火並推動外交進程、實現安全與和平，是目前多數人的渴望，並且根據蓋洛普做的民調顯示，越來越多烏克蘭人同意以領土換取和平（Vigers, 2024），但目前在川普上任後的政策大轉變下，歐洲國家仍聲稱支持烏克蘭恢復主權。一連串國際制裁所造成俄羅斯的孤立和經濟衰退，只會變相讓烏克蘭成為美俄對抗中的犧牲者，無論結果如何，兩件事情是確定的：其一，只要俄羅斯不妥協，最終澤倫斯基政府將可能面臨瓦解與垮臺（戰事不利或長期的損耗）；第二，俄羅斯的國際聲望遭受巨大打擊（無論談判或停戰）。加上戰爭削弱了美歐俄老列強的國力，未來的國際局勢與國際秩序都可能產生巨大變動，這都有待觀察與研究。

收件：2024 年 6 月 4 日

修正：2025 年 1 月 16 日

採用：2025 年 7 月 1 日

參考文獻

- 江昱蓁（2025）。俄烏戰 3 周年 / 停戰在即？俄烏心結難解。聯合新聞網，2 月 1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24068/8537636> [Jiang, Y. J. (2025). Ewu 3 zhounian/ tingzhan zaiji? ewu xinjie nanjie. *udn*, February 10.]
- 杭士基（Chomsky, N.）（2002）。流氓國家（林祐聖譯）。正中書局。（原著出版於 2000）[Chomsky, N. (2002). *Rogue States: The Rule of Force in World Affairs* (Lin, Y. S. Trans.). Cheng Chung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0)]
- 許菁芸（2022）。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之歐亞整合能源戰略。問題與研究，**61**（4），頁 47-88。[https://doi.org/10.30390/ISC.202212_61\(4\).0002](https://doi.org/10.30390/ISC.202212_61(4).0002) [Hsu, J. Y. (2022).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for Eurasian Integration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Issues and Studies*, *61* (4), pp. 47-88.]
- 許菁芸、宋鎮照（2013）。地緣政治與國家主權的關係研究—以車臣和科索沃獨立省思臺海兩岸問題。政治學報，（56），頁 55-78。<https://doi.org/10.6229/CPSR.2013.56.03> [Hsu, J. Y. & Soong, J. J. (2013).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State Sovereignty-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n Chechnya, Kosovo and Taiwa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pp. 55-78.]
- 楊三億（2020）。外交政策選擇的內因或外因探索：烏克蘭與吉爾吉斯的個案研究。台灣政治學刊，**24**（2），頁 67-103。[https://doi.org/10.6683/TPSR.202012_24\(2\).0002](https://doi.org/10.6683/TPSR.202012_24(2).0002) [Yang, S. Y. (2020).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Ukrainian and Kyrgyzstan's Foreign Policies.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4* (2), pp. 67-103.]
- 蔡育岱、譚偉恩（2010）。美國在歐洲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現

- 實主義、自由主義或社會建構論？。全球政治評論，（29），頁 1-28。 <https://doi.org/10.29899/JRM.201001.0001> [Tsai, Y. T. & Tan, W. E. (2010). United States' BMDS Programs in Europe: Testing a Thought of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29), pp. 1-28.]
- Banka, A. (2019). The Breakaways: A Retrospective on the Baltic Road to NATO. *War on the Rocks*, October 4.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10/the-breakaways-a-retrospective-on-the-baltic-road-to-nato/>
- Baskaran, G. & Schwartz, M. (2025). Breaking Down the U.S.-Ukraine Minerals Dea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reaking-down-us-ukraine-minerals-deal>
- Basu, Z. (2021). NATO Chief: “Russia Has No Right to Establish A Sphere of Influence.” *Axios*, December 1. <https://www.axios.com/2021/12/01/nato-russia-ukraine-invasion>
- Bernard, S. & Miller, C. (n.d.). Ukraine’s Battle Against Russia in Maps and Charts: Latest Updates. *Financial Times*. Retrieved May 24,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4351d5b0-0888-4b47-9368-6bc4dfbccbf5>
- Bernstein, B. (2022). McConnell: Biden’s Disastrous Afghanistan Withdrawal Emboldened Putin. *National Review*, March 2.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mcconnell-bidens-disastrous-afghanistan-withdrawal-emboldened-putin/>
- Booth, K. & Wheeler, N. J. (2008). *The Security Dilemma: 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 Boulding, K. E. (1959).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 (2), pp. 120-131.

- Butterfield, H. (1951).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Macmillan.
- Buzan, B. (1991).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arvester Wheatsheat.
- Cancian, M. F. (2024). Will U.S.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Bring Victor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3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ill-us-military-aid-ukraine-bring-victory>
- Collins, A. R. (1997).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Keel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A. R. (1998). GRIT, Gorbachev,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2), pp. 201-219.
- Dickson, J. & Morrow, A. (2022). Putin Signs Documents to Illegally Annex Four Ukrainian Regions, in Drastic Escalation of Russia's War. *The Globe and Mail*, September 30.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putin-signs-documents-to-unlawfully-claim-4-ukrainian-regions-in/>
- Epstein, J. (2023). Ukraine's Front-line Forces are Trying to Fight Their Way Through Russia's Formidable Surovikin Line. Here's What That Is. *Business Insider*, September 7.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kraine-front-line-forces-fighting-through-russia-surovikin-line-2023-9>
- Frizell, S. (2014). Ukraine Protestors Seize Kiev As President Flees. *Time*, February 22. <https://world.time.com/2014/02/22/ukraines-president-flees-protestors-capture-kiev/>
- Gardner, T. & Lewis, S. (2022). U.S. Has Much to Gain from Nord Stream Damage, Russia Says at U.N. *Reuters*, October 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has-much-gain-nord-stream-damage-russia-says-un-2022-09-30/>

- Glaser, C. L. (1992).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44 (4), pp. 497-538.
- Goldgeier, J. & Shiffrinson, J. R. I. (2023). *Evaluating NATO Enlargement: From Cold War Victory to the Russia-Ukraine War*. Palgrave Macmillan.
- Harding, L. (2008). Putin Issues Nuclear Threat to Ukraine Over Plan to Host US Shield. *The Guardian*, February 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feb/13/russia.putin>
- Herz, J. H. (1951).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rz, J. H. (1959).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rton, J., Sardarizadeh, S., Schraer, R., Robinson, O., Coleman, A., Palumbo, D., & Cheetham, J. (2022). Bucha Killings: Satellite Image of Bodies Site Contradicts Russian Claims. *BBC*, April 11. <https://www.bbc.com/news/60981238>
- Jervis, R.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2), pp. 167-214.
- Jervis, R. (1982).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2), pp. 357-378.
- Jervis, R. (1988).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40 (3), pp. 317-349.
- Jervis, R. (2001).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3 (1), pp. 36-60.
- Jones, S. G., McCabe, R., & Palmer A. (2023). Seizing the Initiative

- in Ukraine: Waging War in a Defense Dominant Worl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1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eizing-initiative-ukraine-waging-war-defense-dominant-world>
- Klussmann, U. & Neef, C. (2009). Interview with Ukrainian President Viktor Yushchenko: “The Problems Began After the Orange Revolution.” *Spiegel*, September 7.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terview-with-ukrainian-president-viktor-yushchenko-the-problems-began-after-the-orange-revolution-a-647401.html>
- Kramer, A. E. (2016). Russia Calls New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 “Direct Threa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2.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13/world/europe/russia-nato-us-romania-missile-defense.html?_r=0
- Krieg, G. & Bradner, E. (2023). Takeaways from CNN’s Town Hall with Nikki Haley. *CNN*, June 4. <https://edition.cnn.com/2023/06/04/politics/nikki-haley-cnn-town-hall-takeaways/index.html>
- Kydd, A. H. (2005).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boreiro, J. (2025). Everything We Know So Far About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for Ukraine. *EuroNews*, April 2.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5/04/02/everything-we-know-so-far-about-the-coalition-of-the-willing-for-ukraine>
- Lieber, R. J. (1991). *No Common Powe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Mao, F. (2025). Can Europe Still Count on the US Coming to Its Defence?. *BBC*, February 26. <https://bbc.com/news/articles/c011w1w41xzo>

- Moshes, A. (2019). The Normandy Summit on Ukraine: No Winners, No Losers, To Be Continued.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ember. <https://fiia.fi/en/publication/the-normandy-summit-on-ukraine>
- Moshes, A. & Nizhnikau, R. (2022). Zelenskyy's Change of Approach Towards Russia: From Soft Touch to Firm Hand.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https://fiia.fi/en/publication/zelenskyy-change-of-approach-towards-russia>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6a). NATO-Russia Relations: The Background.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May 18.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pdf_2016_05/20160518_1605-backgrounder_nato-russia_e.pdf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6b). Warsaw Summit Communiqué.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ly 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33169.htm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1).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ne 1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2). Doorstep Statement: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head of the EU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in Defence Format.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ovember 1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09039.htm?selectedLocale=en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5). NATO Response Force (2002-2024).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pril 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49755.htm
-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22). Human Rights Concerns Related to Forced Displacement in Ukraine.

- UN Human Rights Office, September 7.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2/09/human-rights-concerns-related-forced-displacement-ukraine>
- Pacer, V. (2015). *Russ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Dmitry Medvedev, 2008-2012*. Routledge.
- Posen, B. R. (1993).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35 (1), pp. 27-47.
- Rankin, J. (2021). Ex-NATO Head Says Putin Wanted to Join Alliance Early on in His Rule. *The Guardian*, November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nov/04/ex-nato-head-says-putin-wanted-to-join-alliance-early-on-in-his-rule>
- Reuben, A. (2025). How Much Do NATO Members Spend on Defence?. *BBC*, February 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44717074>
- Roe, P. (2001). Actors' Responsibility in 'Tight,' 'Regular,' or 'Loose' Security Dilemmas. *Security Dialogue*, 32 (1), pp. 103-116.
- Roudik, P. (2010). Ukraine: New Law on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Library of Congress*, June 10, <https://www.loc.gov/item/global-legal-monitor/2010-06-10/ukraine-new-law-on-foreign-and-domestic-policy/>
- Shchedrov, O. (2009). Russia Won't Put Missiles in Kaliningrad: Medvedev. *Reuters*, September 2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usa-missiles-idUSTRE58O6ZG20090925/>
- Smeltz, D., Goncharov, S., & Wojtowicz, L. (2016). Levada-Center and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bout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Levada Center*, November 4. https://www.levada.ru/en/2016/11/04/levada-center_chicago_council/
- Smoke, R. (1991). A Theory of Mutual Security. In Smoke, R. & Kortunov, A. (Eds.), *Mutual Security: A New Approach to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 (pp. 59-111). St. Martin's Press.
- Snyder, J. (1985).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In Jervis, R., Lebow, R. N., & Stein, J. G.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pp. 153-179).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aliaferro, J. W. (2000-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3), pp. 128-161.
- Tang, S.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 (3), pp. 587-623.
- Tepperman, J. (2022). Fiona Hill on What Putin's Plotting—and How to Stop Him. *Octavian*, February 18. <https://octavian.substack.com/p/fiona-hill-on-russia-and-ukraine>
- Therrien, A. & Gardner, F. (2025). Hegseth Sets Out Hard Line on European Defence and NATO. *BBC*, February 13.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y0pz3er37jo>
- Vigers, B. (2024). Half of Ukrainians Want Quick, Negotiated End to War: EU, U.K. Favored over U.S. as Negotiators. *Gallup*, November 19. <https://news.gallup.com/poll/653495/half-ukrainians-quick-negotiated-end-war.aspx>
- Waxman, O. B. (2022). Historians on What Putin Gets Wrong About “Denazification” in Ukraine. *Time*, March 3. <https://time.com/6154493/denazification-putin-ukraine-history-context/>
- Wheeler, N. J. & Booth, K. (1992).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Baylis, J. & Rengger, N. J. (Eds.),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9-60). Clarendon Press.
- Wolf, Z. B. (2022). Here's What Biden Has Said About Sending US Troops to Ukraine. *CNN*, February 24. <https://edition.cnn.com/2022/02/24/politics/us-troops-ukraine-russia-nato/index.html>

- Wolfers, A. (1952).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7 (4), pp. 481-502.
- Акопов, П. (2024). Путин предупредил Запад о вступлении в войну. *РИА Новости*, сентября 14. <https://ria.ru/20240914/voynv-1972598774.html>
- Анисимова, Н. (2024). Белый дом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в России заявил о признании реальности. *РБК*, марта 18. <https://www.rbc.ru/politics/18/03/2024/65f89cf19a7947694d064099>
- Черкасов, А. (2022). Люди, стрелявшие в наших отцов.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Европа*, июня 26. <https://novayagazeta.eu/articles/2022/06/26/liudi-streliavshie-v-nashikh-ottsov>
- Соціологічна Група Рейтинг (2022). Електоральні Настрої Населення (11-18 лютого 2022). *Соціологічна Група Рейтинг*, февраль 23. https://ratinggroup.ua/research/ukraine/elektoralnye_nastroeniya_naseleniya_11-18_fevralya_2022_goda.html
- Київський Міжнародний Інститут Соціології (2022). Суспільно-політичні настрої насе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 вибор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їни та Верховної Ради України за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телефонного опитування, проведеного 20-21 січня 2022 року. *Київський Міжнародний Інститут Соціології*, январь 24. <https://www.kiis.com.ua/?lang=ukr&cat=reports&id=1090&page=1>
-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1).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мера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екабря 17.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rso/nato/1790803/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008).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июля 15. <http://kremlin.ru/acts/news/785>

The Outbreak, Evolution, and Trajectory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ual Security Dilemma

Jing-yun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On February 24, 2022,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aunched a full-scale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under the pretext of “demilitariz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Since then, the conflict has escalated into a full-blown war, rapidly becoming the larges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Now entering its fourth year, the war continues within Ukrainian territory, particularly in the eastern regions, causing severe devastation to Ukraine’s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civilian population, with millions of refugees fleeing to various parts of Europe. Despite multiple rounds of negotiations and mediation efforts led by global leaders, no consensus on a ceasefire had been reached. This remained the case until Donald Trump’s victory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2024,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Trump 2.0” era and his renewed efforts to broker a Russia-Ukraine ceasefir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theory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spiral model to analyze the conflict from its outbreak in 2022 to the present, focusing on both mater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tributing factors. It argues that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security dilemmas faced by NATO, Russia, and Ukraine lies in each

party's tendency to take measures — often perceived as enhancing their own security — that unintentionally heighten mutual insecurity. This includes the accumulation of unnecessary offensive capabilities, resulting in a paradox where more power ultimately leads to less security.

Keywords: Russia-Ukraine War, Security Dilemmas, Spiral Model, NATO, Ukraine